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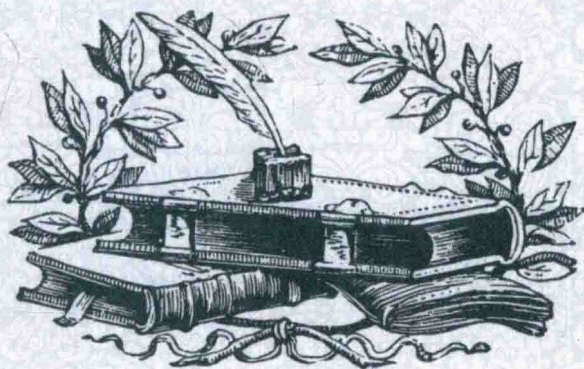
——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研究生教材 ——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изучению
советско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苏俄翻译理论导读

主编 胡谷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研究生教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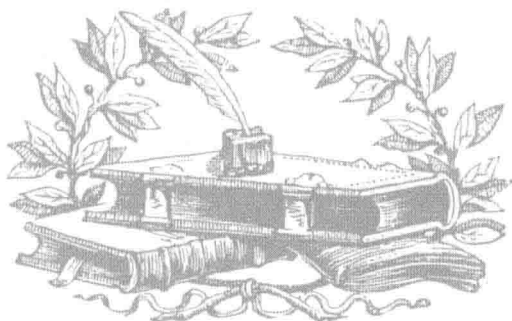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изучению
советско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苏俄翻译理论导读

主 编 胡谷明

副主编 张鸿彦 刘 早 毛志文 聂 品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俄翻译理论导读/胡谷明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11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研究生教材
ISBN 978-7-307-18875-4

I. 苏… II. 胡… III. 俄语—翻译理论—研究生—教材 IV. H3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7240 号

责任编辑:叶玲利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300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8875-4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翻译理论”课程是俄语学科点翻译学方向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俄罗斯在翻译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涌现的翻译名家和翻译理论流派，熟悉不同的翻译研究视角，为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书共 17 章，适用于一个学期的教学，每章用时 3 小时，每周 1 章。建议先布置阅读任务让学生在课前预习材料，然后在课堂上汇报相关读书体会，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本书是作者从事本课程教学，研读了大量俄语原著和相关资料，在所写讲义的基础上成书的。我们选取了 14 位在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有影响的翻译家，主要介绍他们的主要翻译思想。本书的特点是概括性强，语言通俗易懂，讲述层次清楚，每章后附有思考题。

本书由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胡谷明负责组织和统稿工作，并承担大部分的写作任务。张鸿彦负责撰写第十三章斯多布尼科夫的翻译理论和第十四章加尔博夫斯基的翻译理论；刘早负责撰写第七章什维采尔的翻译理论，第十章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的翻译理论和第十一章明亚尔-别洛鲁切夫的翻译理论；毛志文负责撰写第六章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聂品负责撰写第十五章维诺格拉多夫的翻译理论和第十六章阿列克谢耶娃的翻译理论；其余各章由胡谷明负责撰写。

本书用中文写成，因此它不仅适用于俄语专业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包括学术型学位和 MTI 应用型翻译专业学位），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语种翻译方向的研究生，以及对苏俄翻译理论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的出版得到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精品课程项目经费的资助和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一定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敬请同行们批评指正。

作 者

2016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苏俄翻译理论概览.....	1
第二章	苏俄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	16
第三章	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	27
第四章	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理论	48
第五章	加切奇拉泽的翻译理论	59
第六章	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	68
第七章	什维采尔的翻译理论	89
第八章	拉特舍夫的翻译理论.....	100
第九章	列茨克尔的翻译理论.....	111
第十章	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的翻译理论.....	121
第十一章	明亚尔-别洛鲁切夫的翻译理论	130
第十二章	托佩尔的翻译理论.....	140
第十三章	斯多布尼科夫的翻译理论.....	147
第十四章	加尔博夫斯基的翻译理论.....	162
第十五章	维诺格拉多夫的翻译理论.....	174
第十六章	阿列克谢耶娃的翻译理论.....	185
第十七章	口译能力及其培养途径	194
参考书目		201

第一章 苏俄翻译理论概览

提起俄罗斯,人们首先会联想到其享誉世界的文学传统,精湛的艺术和强大的军事科学和国防工业。其实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俄罗斯科学家的一席之地,其中也包括翻译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的翻译学研究丝毫不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翻译研究逊色,只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波折发展而未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使得俄语不能成为强势语言,也就是说,使用俄语的人不多,市场太小,因而俄罗斯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推介和研究。下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苏俄翻译理论。“苏俄”是指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和解体后的俄罗斯时期。我们将苏俄翻译理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翻译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翻译理论。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翻译理论

1. 18 世纪及其之前的翻译理论

人类自从开始有民族间交往活动起就存在翻译活动,但开始研究翻译的时间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他主张活译,反对直译,主张译作超过原作,主要著作有《论最优秀的演说家》。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72 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将《圣经·旧约》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即《七十子希腊文本》^①。而俄罗斯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是公元 9 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这个时期基辅罗斯的作品主要来自保加利亚,是从希腊语翻译的古斯拉夫语译本。这些译本包括《圣经》、宗教训诫著作、记述圣徒生平事迹的传记和个别的历史著作。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始于 18 世纪,18 世纪初翻译的首要任务是翻译军事、科技、法律等方面的著作,随着这些专业技术书籍的出版,在俄罗斯供公众阅读的翻译文学很快拓宽了自己的领域,诗歌、小说和戏剧文本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段时间里不少译者都试图确定文学作品的译本应该是怎样的,这就是早期的翻译理论。1748 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苏马罗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умароков, 1717—1777)出版了《有关俄语的书简》(Епистола о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他在这本书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在译文里转达原著的意思,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即运用本民族语的全部财富来达到这一点。此外,他还鲜明地反对逐字翻译,认为对译者和对作者

^① 参见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4 页。

应持一视同仁的态度，把译者与作者画上等号。

18 世纪对俄罗斯译事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转折时期。彼得大帝的改革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体现在俄罗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个时期俄罗斯大量译介了外国科学技术文献和外国文学作品，引入了大量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概念，但大量的逐字翻译导致了翻译质量的下降。彼得大帝本人很关心翻译事业的发展，他要求译本“文字清晰和风格优美”，“不用高雅之斯拉夫语词”，“意思表达得明白”。^① 1724 年他专门为当时的翻译做了御批，他说：“译书急需译者，科技著作之翻译尤其如此。若译者不懂技术则无翻译可言。为此应早做准备，务必使通晓语言而不懂技术者去学习技术，懂技术而不通晓外语者去学习语言。务必使所有俄罗斯人、生于此地的外国人、自幼就来到此地的外国人都把我们的语言当作本国语言来学习，因为把外语译成本国语言总是易于把本国语言译成外语。”^②此外，彼得大帝本人对逐字翻译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在俄罗斯的翻译活动中有不少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18 世纪就有几位非常杰出的诗人和文学活动家，他们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苏马罗科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Кириллович 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1703—1769）、杰尔查文（Гавриил Романович Державин，1743—1816）等，他们对待翻译的态度特别积极，特别富有创造力。例如，在这些兼作翻译的诗人之间进行的特殊竞赛颇具典型性。参与这类竞赛的有当时俄罗斯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Михаил Матвеевич Херасков，1733—1807）、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这类竞赛通常在两三个诗人之间进行，同一部作品，由两三个诗人同时翻译。1743 年举行过一次，由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三人参加，他们同时翻译第 143 首圣歌。1760 年又举办一次，由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两人参加，翻译卢梭的《幸福颂》。他们的译作都刊登在刚刚出版的杂志上。常常是同时发表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文，不署译者的名，供“文学爱好者和同行”评判。

18 世纪还有一位剧作家值得一提，他就是弗拉基米尔·伊格纳季耶维奇·卢金（Владимир Игнатьевич Лукин，1737—1794），他经常用俄罗斯风格改编外国作家的剧本。他主张翻译外国作品时需“使之适应俄罗斯习惯”（склонение на русские нравы）。这一主张在 19 世纪上半叶得到很多作家的响应，但在后世这一主张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2. 19 世纪初的翻译理论

19 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典型人物是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1783—1852）。他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实践家和翻译理论家，他

^① 参见 М. П. Топер. Перевод в систем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М., 《Наследие》，2001, стр. 53.

^② 参见 М. П. Топер. Перевод в систем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М., 《Наследие》，2001, стр. 53.

倾向于法国 18 世纪的翻译观,即“完善原作说”。这种翻译方法往往会使译作与原作相去甚远。

茹科夫斯基认为,诗歌的译者在处理原作时应享有很大的创作自由,这是因为两种语言不是对应的,译者必须寻觅能充分表达主人公性格和感受的、揭示所译文本全部意义的手段。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译者是‘表达’的创造者,因为他拥有自己用于表达的素材,他没有任何指导、没有任何其他的参考材料,‘至于原著作者的表达方式呢’,译者在本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的,它们应该由译者来创造。但只有在他的头脑充满了他所译的诗歌中诗人的理想,而且把这种理想转为自己的想象时,他才能创造出来……”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作为文本来说,诗歌比散文崇高,因此,茹科夫斯基在对比散文翻译和诗歌翻译时说:“译者在译散文时是奴隶,译者在译诗歌时是竞争对手。”茹科夫斯基在论述翻译时,所有笔墨都围绕着诗歌这个主题,正是在诗歌这个最“崇高”的层次上才能发展这样的思想——译者应该再现使作者受到鼓舞的那个“理想”,并根据美学原则创造自己的译文。

19 世纪另一位重要的翻译家是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Вяземский, 1792—1878),他是诗人也是翻译家。他在谈到翻译方法时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一种是自主的(независимый),另一种是受制的(подчинённый)。按照前一种方法,译者充分领会原著的意义和精神,然后把它们注入自己的形式;按照后一种译法,他既要尽量保留形式本身,当然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笔下惯用的诗歌语言,前一种译法有其优越之处,后一种吃力不讨好;两者之中我选择了后者。”^①维亚泽姆斯基还主张以散文译诗。维亚泽姆斯基的翻译方法和原则是在形式上逐词逐句地根据原著的意义和句法“亦步亦趋”地处理,他使用俄语进行翻译试验,经常只遵守俄语基本的语法规则,而不顾它的修辞规范。但这种方法和原则没有得到普及,对俄国翻译事业没有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的译作不多,但在俄罗斯的翻译史上却具有独特的地位。他翻译过拜伦、席勒、海涅和歌德的诗歌。他的译风对原著而言颇具独立性,有的诗仅保留了原作的主题,表达方式则与原作迥然不同。他在译诗时对诗中的主题和细节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增删,仅仅突出原著的典型特征。尽管如此,莱蒙托夫的翻译活动意义重大,这是因为他的译作可纳入他自己的创作轨道,与后来成为经典的俄国诗歌一样堪称佳作。这些译作的艺术成就对翻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了一条原则:译本感染力首先取决于它作为俄语作品的文学力量。在我国,林纾的译作就是如此。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1837)特别关注翻译,尽管他留下的翻译作品不多,但他是从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翻译问题的。普希金的译作与原作在字面意义上相去甚远,几近重新创作。他作为翻译家的意义在于,在译作中他是用自己确立的俄罗斯标准语再现外国原著的;其次,他在自己创作的鼎盛时期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方法的特征——注重典型的特点,概括反映原著

① 吴克礼主编:《苏俄翻译理论评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第35页。

历史特征和个性特征的技巧。托马舍夫斯基(Б. В. Томашевский)在评论普希金翻译法国诗人的作品时说:“普希金译诗的目的不是准确地转达原著,而是借用其它语言中业已存在的形式丰富自己的诗歌财富。”这一观点是十分中肯的,也适用于普希金的其他译作。17—18 世纪法国的译风以“饰文”(украшающий перевод)和“纠正”(исправи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原文为荣。这种风气遭到普希金的严厉批评,因为普希金提倡尊重外国作者的特点,同时又反对逐字死译,他认为逐字死译会导致对母语的践踏,所以他一方面要求在意义上忠实原文,另一方面应保留原著的特色。普希金认为,逐字翻译永远不可能是正确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用语、自己约定俗成的修辞手段、自己惯用的表达方式,而这一切是不可能用相应的词汇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例如,把 How do you do? 逐字试译成俄语就成了 Как ты делаешь? (你是怎么做的?)可见普希金不是笼统地否认翻译的可能性,而是不同意逐字死译,不同意用“相应的词汇”来表达。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在 1834 年 4 月 20 日写给马克西姆维奇(М. А. Максимович)的信中写道:“谈到译著,我想对你说几句,有时必须故意远离原著的词语才能更接近原著。有一些句子、表达法、用语从我们小俄罗斯人(指乌克兰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词对词地翻译,俄罗斯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它们有时会破坏原著一半的力量,因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鸿沟。特色鲜明而言简意赅的地方用俄语来表达几乎永远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合俄语的精神,那时最好不要把它略去,而是使用十个词汇把它的意思和盘托出”,他接着写道“在翻译时,贴近思想比贴近词汇更加重要,虽然后者非常具有诱惑力,我承认,我自己现在谈这个问题时虽然抱着冷静、公正的态度,但难保会把一个音调铿锵的词儿硬塞进俄语中去,还满以为人家都会这样理解它。你要记住,你的翻译是供俄罗斯人阅读的,因此小俄罗斯人的用语……统统滚蛋!”他的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另外,果戈里是第一个提出译者创作个性问题的人,他指出:“译者所做的一切是让你看不见他:他如同一块透明的玻璃,透明得似乎没有玻璃,但它又实实在在存在。”这一形象的说法至今还有很多人引用,也有不少争论。译者不可能凌驾于他所译作品的主观感受之上,同时他的创作个性也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不可能不反映在译文中。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是 19 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当时俄罗斯文学活动中涉足译坛最多的一位。他精通法语,发表了大量论述翻译和评论译著的文章。别林斯基的翻译观与普希金非常接近,他反对逐字死译,认为翻译的语言任务在于再现原著的精神:他强调翻译选材的重要性,呼吁译者翻译那些既有思想性又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别林斯基特别强调建立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他把理论理解为对实践的概括,同时又应当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他在评论波列伏依(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олевой, 1796—1846)翻译的《哈姆雷特》时指出:“贴近原著不是传达原著的字面意义,而是传达原著的精神。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法,特点和特质;这些独特之处非常突出,因此要正确转达某一形象或句子,有时必须在译文中彻底改变它们。相应的形象和相应的句子一样,不一定在于字眼表面上的一致:应该使译文的内在生命力符合原著的内在生命力。”别林斯基认为波列伏依译文的优点在于,译者竭力要完成这一任务:“……波列伏依的译笔

从头到尾显得洒脱,看得出,他竭力在传递精神,而不是字面意义。因此有时他偏离原著反而忠实地表达了原著:这就是翻译的奥秘所在。”别林斯基还指出:“翻译文艺作品的规则只有一条——传达所译作品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把它译成俄语时,译得像作者自己用俄语写的那样,如同作者是俄罗斯人。”同时他反对随心所欲地翻译,他说:“在文艺翻译里不允许有删节、增添或改动。如果原作有缺陷,也应该把缺陷原封不动地传达出来。这类译本的目的是尽可能代替原本,从而使因不通语言而无法阅读原著的人也有欣赏和评论原著的手段和可能。”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别林斯基首先反对形形色色的“改写”派、“饰文”派,要求译者保留原著的特点,甚至包括它的缺点。其次,他认为译著是原著的真正替代品,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传达原作的精神”这一说法贯穿在别林斯基论述翻译问题的所有论著和文章中。

别林斯基在彻底埋葬“改写说”和“使之适应俄罗斯习惯说”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翻译作品保留原著的民族特点是翻译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认为翻译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中介。但民族特色与可译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别林斯基。开始他得出结论:特色非常鲜明的作品不可能译成其他语言。继而又确信,正是这类作品对于翻译来说才最有意义,因为外国读者可以通过译著更多地了解作家所属民族的生活。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关于翻译的言论不多,但有特点。他指出译者必须“有天才、有创作天赋”,这种天赋可以理解成“善于诗意地再现他们心爱的诗人给他们留下印象的能力”,并以“悟性成分”为主。屠格涅夫写道:“任何翻译的主要对象都是看不懂原著的人。译者的工作不应该是为看懂原著的人们提供评论他所译的某一诗句或某一用语忠实与否的机会,而应该是为‘大众’……但是对广大读者起作用的只是美轮美奂的东西,只有天才;天才、创作天赋是译者所必备的;一丝不苟的认真和忠实是不够的。有什么东西能比银板照相更加奴隶似的忠实呢?可是一幅好的肖像画不是比任何一幅银板相片更美丽、更准确千万倍吗?”

3. 19 世纪下半叶的翻译理论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翻译活动在数量、体裁、题材、翻译所用的语言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但在质量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远不如 19 世纪初。究其原因,首先是 19 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生活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所致,此时托尔斯泰(Л. Толстой)、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契诃夫(А. Чехов)等一批作家活跃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上;翻译文学,即使是翻译莎士比亚或者歌德的作品,对俄罗斯读者和社会已经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这些文豪与俄罗斯读者初次谋面时引起的那种轰动效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是“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的翻译文学实在比原创文学好”。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非常重视翻译文学,高度评价了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的影响,他在 1856 年评《俄国诗人所译的席勒抒情诗》一文中写道:“……文学历史作品若要避免极其不利的片面性,就必须让大家比现在更加关注翻译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关注选材问题,他特别强调译者选材的责任心,竭力反对不加思考地、不成系统地、随心所欲地选材。

他反对在传达原文时追求过于贴近原文,即逐字逐句贴近原文的做法,同时也反对译者违反标准语规范而任意妄为。他写道:“……以损害语言的明晰和正确为代价去追求逐字翻译,意味着有损翻译的准确性,因为原著里清楚的东西在译文里也应该是清楚的,否则要翻译干什么呢?”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861)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却早早地登上了译坛。他认为古典作品的翻译家首先应该是诗人,其次应该是个学者,此外应该能娴熟地驾驭自己的母语。他要求翻译不拘泥于原文,他竭力反对意义上的种种歪曲,这类歪曲或因译者对原文语言不够熟悉,或因粗枝大叶和随心所欲所致,其结果是贬低作者的风格,并使其平庸化。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翻译的任务就是激发“读者产生原著所传递的那种情绪”。

这一时期的翻译家还有韦坚斯基(Иринарх Иванович Введенский, 1813—1855)、费特(Афанасий Афанасиевич Фет, 1820—1892)、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 Ларио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 1829—1865)、皮萨列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исарев, 1840—1868)等。

4.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翻译理论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大作家越来越少地涉足译坛。这一时期译坛的代表人物是魏因贝格(П. И. Вейнберг)。他除了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之外,还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他第一次提出“优秀翻译”的思想,并把“优秀翻译”作为翻译评价的标准。优秀翻译要求充分再现原作的所有细节,包括它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努力使不懂外语的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读原作时相同的印象。

19 世纪末俄国译坛的特点是翻译的总体水平明显降低,在翻译理论方面依然缺乏真知灼见。在 20 世纪开头的一二十年里,俄罗斯文坛上的翻译活动呈现出矛盾的性质。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这个阶段,外国文学通过俄译本如潮水般涌入俄罗斯,其中有经典作品,也有同时代的作品,而且所译文学的国别也有所扩大,如西班牙文学、意大利文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文学等。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了解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的新人物。象征主义作家和与认同该流派观点的作家们所创办的刊物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往激增,成为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化生活的一大特征。但文学界普遍对散文翻译不屑一顾,没有专门人才从事这项工作,造成这个时期译著的质量低下。然而在诗歌翻译领域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诗歌翻译与“白银时代”的原创诗歌一起经历着高潮。俄国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代表们的翻译活动是以选材的片面性为特点的。他们痴迷西方文学,非常积极地参与诗歌的翻译。象征主义诗人对诗歌的形式情有独钟。他们在翻译时对形式精雕细刻,往往情不自禁地忘记了翻译的目的在于传达原著的形式以及内容,而错误地把形式看成是可与内容脱离而独立存在的东西。

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翻译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рюсов, 1873—1924),他对翻译持一种矛盾的观点,他说:“把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但要放弃这一理想也是不

可能的。”他认为翻译方法就是在所译的作品中挑选你认为最重要的成分。

要理解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中的翻译活动以及这一活动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 1880—1921)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他对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他的一生都与翻译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亲自翻译外,他还出版、编辑、评论、翻译书籍。勃洛克对翻译的选材十分讲究,他只挑那些与他意趣相投的作品。追求译文接近原文是勃洛克一生翻译思想的主旋律,对于勃洛克来说,再现原著的诗格是译者的最大追求。

5. 苏联翻译理论的形成

苏联立国后,俄罗斯的翻译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翻译理论形成的阶段。翻译理论的形成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在于,俄罗斯自古至今已有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从整体上看,成果丰硕,佳译连篇,对本土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此外语言学的迅猛发展也为翻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外部原因在于,十月革命后,苏联需要了解和借鉴世界文学遗产和同时代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了解和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创立。此外,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在中学和大学都开设了外语课程,当然也包括翻译课程,作为中、高等专业学校必修课的翻译课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套术语、一套便于教师教学和便于学生接受的可操作方法,这也促成了翻译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发展。最后,翻译作为各国、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桥梁,与其他活动相比最容易得风气之先,世界先进的语言学思想,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成果,甚至科技的新成就对翻译(同声翻译、机器翻译)来说都有促进作用。

高尔基在苏联翻译理论形成的最初阶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作为译著的编辑和批评家、作为翻译事业的组织者,在自己的活动中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 19 世纪普希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形成的翻译原则和要求。

1919 年,在高尔基的倡议和领导下,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国立世界文学出版社,其目的是有系统地出版外国文学中优秀作品的新译本或重新校订的新译本,不仅包括西方名著,而且包括东方著作,之后还包括苏联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原计划出版 1 500 本,但由于当时的物质困难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到 1927 年这项工作停止时,只出版了 120 本书。但作为出版社活动基础的翻译原则本身却极具意义。这些原则是:有计划地选取所译的作品和努力提高译文质量,尽量使译文准确、在艺术上真实可信,不允许任何任意妄为(произвол)或逐字翻译,使译著具有学术根据。

为了提高译文质量,展现原作的风格,高尔基在出版社中专门成立了翻译家工作室,还出版了第一本俄语翻译参考书——《文艺翻译原则》(Принцип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手册,阐述了散文和诗歌翻译的基本方法。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起,高尔基提倡的关于选材要有计划性和译著应该高质量的原则日益为译坛所接受。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翻译家和译著,如米哈伊尔·列昂尼多维奇·洛津斯基(Михаил Леонидович Лозинский, 1886—1955)、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马尔夏克(Самуил Яковлевич Маршак, 1887—1964)等。30 年代苏联开展的

大规模翻译活动让读者了解了苏联各民族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成果,因为该时期是苏联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发展的繁荣时期。翻译文学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快就演变为对理论问题的兴趣。杰出的翻译大师们纷纷发表关于翻译艺术的原则性意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ковский, 1882—1969)发表的一篇文章《散文的翻译》,后来这篇文章几经增补而加工成书。这篇文章最大的优点在于,针对翻译中的各种困难,作者都力图在实践基础上建设性地加以解决;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他始终以生动而千姿百态的规范俄语为根据,始终以再现原作艺术特点为己任。后来他论述翻译的著作几经再版:《翻译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 1936年;《崇高的艺术》(Высо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1941年。

楚科夫斯基是苏联文艺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但他并未提出一整套系统性理论。楚科夫斯基对翻译的看法:“优秀的翻译工作者……不是工匠,不是临摹画家,而是艺术家。他不是像当时大家认为的那样为原著拍照,而是创造性地再现原著。原著的文本是他复杂和灵感丛生的创作材料。翻译工作者首先是天才。要翻译巴尔扎克,他必须把自己化为巴尔扎克,哪怕是一部分也行,领会他的气质、沐浴他的激情、体验他对生活的诗意感受。”可见他把翻译视为艺术,而且是崇高的艺术。据此,他指出译者最好选择与自己性格、情趣相投的作者来翻译,否则会事与愿违。在这个前提下,译者必须追求译著的整体风格与原著相符,也就是说,译者必须把作者的思想、面貌、声音、技巧、风格等全部再现出来,即把体现原著整体风格的艺术个性再现出来。楚科夫斯基断言,文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再现原著的艺术特征。做到了这一点,个别词语的误译或处理不当可以忽略不计。译者应该力戒把自己的情趣、习惯和观点带入译文,应该客观地分析原著思想和风格的所有特点,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著的艺术个性。他还强调译者在行文时应避免外国腔,应拿出符合译入语句法原则的地道译文,使读者感觉不到自己在读外国作品。即使要模仿外文句法,也不能违背译入语的句法习惯。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翻译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翻译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各国更加频繁的交往。联合国(1945年)等国际组织的相继出现要求苏联培养大量的翻译干部,尤其是年轻的翻译工作者。这向苏联的高校提出了培养外语和翻译方面紧缺人才的任务。这项任务不仅要求高校尽快完善翻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也要求翻译理论研究的突破。国际语言学界对翻译问题的关注为苏联译坛提供了新颖的理论武器。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开始使用一种特殊的口译形式——同声翻译。此外,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机器翻译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这些都为翻译理论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托。

1.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与文艺学派翻译理论之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翻译界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与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论战。论战的导火索是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1953年第一版)。此书一

问世就引起译坛的大辩论。

首先介绍一下费道罗夫其人,他的全名是安德烈·韦涅季克托维奇·费道罗夫(Андрей Венедиктович Фёдоров, 1906—1997),他是翻译理论语言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是第一个提出“翻译理论”概念和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描述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学者。他担任过列宁格勒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研究。他一生共著有150多篇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论文、随笔和各种评论文章,出版了十部专著。主要著作有《翻译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1930)、《论文艺翻译》(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переводе)(1941)、《翻译理论概要》(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1953)、《普通修辞学和比较修辞学概论》(Очерки общей и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й стилистики)(1971)、《翻译艺术和文学生活·随笔》(Искус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 и жизнь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черки)(1983)等。

费道罗夫分别在不同时期分四次修订出版了同一部翻译专著,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体系。一本专著先后修订再版四次,这在翻译史上也是少见的,而在每一次的修订中作者都采纳了文艺学派所提出的合理批评意见,从而使自己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不断得到完善。1953年他出版了第一版《翻译理论概要》(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1958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除保留原来的书名外,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即《翻译理论概要——语言学问题》(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1968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更名为《翻译通论基础——语言学描写》(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1983年出版了第四版,书名为《翻译通论基础——语言学问题》(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2002年在费道罗夫去世五周年之际,出版社再次将第四版进行了重印。

这四个版本,每一版都有新的补充和改进。该书第一版是苏联首部从语言学的角度全面研究翻译理论的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者在书中把翻译问题视为纯语言学问题,忽视了翻译理论与其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的联系,结果引起了国内外批评界的反对。1958年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概要》第二版中对原书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尽管也承认翻译领域的问题不能全部通过语言学方法来解释,但他仍坚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是正确的和必须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翻译艺术的真正理论。他强调指出,文艺翻译确有其特点,应突出其美学方面,但是文学形象是语言手段创造的,也必须用另一种语言的手段来传达,因此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是基础。费道罗夫在保留原书名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副标题“语言学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该书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仅限于语言问题。同时他还指出,这本书不是关于文艺翻译的书,文艺翻译是翻译活动的最高形式,书中只是把它作为翻译通论的一部分进行描述的。

然而,当第二版出来之后仍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认为他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思中缺乏连贯性,在文艺翻译的章节中使用了一些文艺学的和普通美学的范畴等。这主要是《普通翻译与机器翻译概论》(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и маши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一书的作者列夫津(И. И. Ревзин)和罗津茨维格(В. Ю. Розенцвейг)的看法。1968年费道罗夫根据新的情况对《翻译理论概要》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出版了该书第三版,并更名为《翻

译通论基础》(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理由是,这样可以突出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对各种翻译现象和各类翻译进行研究,揭示它们的共性和各自的特性,并从语言的角度进行对比。在该书中费道罗夫明确地指出,决不应忘记最终的任务是建立普通语文学翻译理论。时至今日还坚持只通过文艺学,或只通过语言学的途径来研究文艺翻译,已经过时了。当代是不同的学科,甚至是相距甚远的学科(如语言学和数学)空前密切合作的时期。而在语文学中,文艺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分支之间分歧并不很大,它不是无可避免的,而是可以克服的,也就是说,可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在第三版中费道罗夫强调翻译理论是一门学科,并且写进了书名。费道罗夫认为,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比较分析两种语言文本资料的基础上的,在文本的基础上弄清各种不同的翻译手段和方法有助于把翻译作为一种过程和一种心理活动来理解。

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53年费道罗夫出版《翻译理论概要》之后,1954年,诗人和翻译家安托科尔斯基(П. Г.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等人在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联名做了专题报告,指责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概要》中没有提到作为文艺翻译理论核心问题的美学问题,他们强调翻译是艺术,因此必须从文艺学,而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并证明费道罗夫的理论观点是有害的和不能接受的。《翻译理论概要》的某些批评者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用“客观地确定语际对应”这种受到限制的事实来贬低文学翻译的特点,甚至是对作为艺术家的翻译家创作权利的威胁。

自此,文艺学派以苏联作家出版社发行的《翻译技巧》(Мастер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为阵地,阐述文艺学派的观点,批驳语言学派的论点;而以巴尔胡达罗夫为主编的《翻译工作者札记》(Тетрадь переводчика)为另一方阵地,发表语言学派的看法和意见并对文艺学派加以抨击。两派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苏联译坛的重要现象。

罗塞尔斯(В. М. Россельс)主编的论文集《文艺翻译问题》(Вопрос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和《翻译技巧》相继发表文章,对费道罗夫的论著加以批驳。这些文章的作者们认为,只有用文艺方法对待翻译问题才是合情合理和富有成效的,因此否定语言学在翻译理论中的意义,要对它加以限制,甚至否定,尽量把语言学范畴排斥在翻译理论研究之外。费道罗夫一方面撰文对以卡什金为代表的观点表示异议,另一方面也不同意索博列夫在《论以形象译形象》(О переводе образа образом)一文中提出的集中精力传达原作“形象”的说法。费道罗夫指出,形象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语言体现而存在于文学之中。他认为对立派在译入语言手段的研究中看到了形式主义的危险,把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与翻译实践上的形式主义和逐字翻译方法联系起来,因此他指出,这证明了文艺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幼稚,因为这些担心的基础是把理论原则同有可能出现的实践结果混为一谈。

苏联翻译的文艺学派由来已久,在语言学派没有出现前,一直是文艺学派一统天下,那时即使有不同看法,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如逐字翻译与任意翻译)也是文艺学派内部的分歧。苏联翻译理论第一代文艺学派代表可推高尔基、楚科夫斯基等人,“二战”以后文艺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卡什金、加切奇拉泽(Гиви Гачечиладзе)等人。

卡什金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现实主义翻译”(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的思想。这一思想是按照“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艺术”类推而成的。卡什金指出,现实主义翻译是最完善的翻译方法,同时也是一条符合规范的原则,其内涵是:“……译者在原作中首先会碰到外国的语法体系,此时对他至关重要是冲破这重屏障,领会作者直接感受现实时的原始新鲜感。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可能找到同样有力的新鲜语言来重新表达。苏联译者尽力看到原作语言背后的现象、思想、事物、行为和状态,并感受它们,然后忠实、完整和具体地将作者看到的这一现实再现出来……这种方法有利于译者和读者认清文字表达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本质,它的矛盾和它的动态。”

卡什金提出的现实主义翻译概念引起了翻译界的兴趣,同时也引发了讨论和争议。对于卡什金关于现实主义翻译本质的言论,费道罗夫认为,其中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他对作为文本、作为语言表达手段体系的原著作用明显估计不足。至于说什么“外国的语法体系”像“屏障”,什么译者应该“冲破这重屏障,领会作者直接感受现实时的原始新鲜感”云云也令人费解。接着他指出,外国语言的语法体系就像其词汇一样,屏障和障碍只是对那些不精通这一语言的人来说的,又或者是对那些天真而误以为外国的语法体系和词汇语义体系是可以机械地复制的译者来说的。费道罗夫因此强调,事实上原作的文字织体——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结构——对于精通原作语言和忠实地评价原作语言与母语关系的译者来说并不是“屏障”,而是通向文学现实的敞开的大门,这一现实是在原作中展示的,而卡什金却建议不要在原作中寻找它,而是通过原作,在原作背后,在原作文本的背后寻找它。

然而,加切奇拉泽与其他赞同这个观点的理论工作者一样,想把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他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说:“……卡什金的出发点是认为翻译应该现实地、准确地反映原作中所反映的现实这样笼统的观点。然而根据我们的意见,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对译者来说直接反映的客体是原作本身,即原作的艺术现实,而不是当时由原作间接反映的那个直接的具体现实。”

总结两大派的这场争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文艺学派的成员多为诗人、作家和文艺学学者,故强调文艺翻译是艺术,翻译家应是天才和艺术家。因此文艺翻译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属于美学范畴。翻译的对象是形象、感情和艺术特色,对文艺翻译的要求是从整体上再现原著的艺术特点、原作的艺术个性。而语言学派的成员多为语言学家和翻译教学工作者,故希望建立一个囊括各种语体的翻译通论,把翻译视为一种语言行为,重视两种语言的对比以寻找其中的规律性对应单位,而翻译的任务是通过等值或等同的方法从整体上再现原著的语言功能。

(2)如果比较一下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的理论在苏联外语和翻译教学中的使用情况,也不难发现,语言学派的研究成果往往很快就反映在翻译实践,翻译教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并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而文艺学派的观点因为缺乏教学中的可操作性所以较少反映在翻译教学里。可见,语言学派有高校的师资为其后盾并不断从那里得到补充,而文艺学派则没有。

2. 苏俄现代译论综述

综观俄罗斯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发现,俄罗斯翻译理论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的经验之谈到系统论述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苏俄现代译论对世界翻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前,文艺翻译理论曾在俄罗斯翻译理论中占主导地位。50年代起,翻译的语言学派开始崛起,并与文艺学派展开热烈的学术争论,而到了80年代,这场争论趋于平息,语言学派的翻译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苏俄现代翻译理论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的翻译理论,其发端的标志是费道罗夫所著的《翻译理论概要》(1953)一书。时至今日,苏俄现代译论的发展已历经50多年的时间。它在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的论战之后,不断吸收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确立了以语言学研究为主导思想的现代翻译理论。在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如费道罗夫、列茨克尔、加切奇拉泽、卡什金、巴尔胡达罗夫、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利沃夫斯卡娅、什维策尔、拉特舍夫、科米萨罗夫、明亚尔-别洛鲁切夫等。

从总体上来看,翻译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苏联和俄罗斯经历了产生、发展与确立的过程,而语言学派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主流,在自身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科学的知识并与之进行交叉。

苏联的翻译理论是十月革命后应国内文化建设的需求而产生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其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一直缺乏系统性。1953年,费道罗夫的论著《翻译理论概要》出版。这是苏联第一部从语言学角度系统研究翻译理论的专著。该书一问世,便引起热烈反响。作者提出,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任何体裁作品的翻译都要借助两种语言的对比,所以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的领域内求得解决。这一点遭到了以加切奇拉泽和卡什金为主要代表的文艺学派的反驳。他们认为费道罗夫忽略了文艺翻译中的美学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整个文艺翻译理论的核心。文艺学派认为,应当把翻译视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形式,即应当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翻译,而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过激烈的辩论,费道罗夫接受了一些批评,在该书的后三版中(1958, 1968, 1983)逐步修正原先过激的观点,承认语言学的方法不能解决翻译领域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但是他坚持该方法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必要的途径。如果说文艺翻译作为语文学中的一个特殊领域,需要语言学与文学和源语民族的历史密切配合,那么,翻译通论则要首先提出一系列语言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基础。

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之间的争论持续了20多年。前者多为语言学家、高校翻译教学工作,以《翻译工作者札记》这本刊物为喉舌;后者多为作家、翻译家,曾出版《文艺翻译问题》和《翻译技巧》,阐明自己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场争论趋于平息。实际上,文艺学派着重强调了文艺作品的翻译,属翻译专论;而语言学派的研究则侧重于翻译通论,即研究包含文艺作品在内的所有体裁作品的翻译问题。两派论战的结果使人们认清了翻译理论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单靠某一个学科是不够的。

事实上,由于文艺学派的研究缺乏操作性,它在苏联时期就逐步让位于语言学派。